

文
史
科
專
輯

(一)

民革大连市委员会

序

边 长 泰

文史委员会编辑的第一本文史资料的大样摆在我面前，他们要我写序，推卸是不可能的。

本书中的首篇谈大连市民革的创建，反映出民革大连市委在中国共产党关怀及其统战政策的指导下，由无到有，成员由少到多的发展历程，这同时就把民革与共产党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参政议政的政党。

书中有民革普通成员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有对为民族利益献聪明才智、发挥应有作用的历史人物的记叙；同时也收录了民革大连市委的成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入侵我中华的日寇斗争史实，对辛亥革命先辈的缅怀，以及对历史遗迹的考探。他们忆寻着历史迈着不轻松的步子留下的痕迹，企图为子孙后代留下可资研究的史料，这是一种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使然，也是成员们的爱国赤子心的昭示。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顶巅，经受八面来风，民革组织有义务、有责任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为振兴中华、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绵薄之力。这本小册子正是民革成员的热忱之一隅。当然，我更期望我们的成员能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中国共产党分忧解难，高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旗帜，坚定地走在四化建设大军的

行列里，再为人民立新功。

写出这些文章的，都是离、退休的七、八十岁的老同志，他们在盛夏浑汗走笔，尽心尽力地认真工作态度和竭诚散发“余热”的精神令我钦佩，他们做了一件切切实实的有益的事。我谨将这些议论之词权且当作感激他们的祝福之语吧。

1988.10 于大连

目 录

大连民革的创建及“文革”前活动概况	庞赫中	(1)
回忆我的父亲朱庆澜	朱 树	(10)
日冠统治下的大连取引所(交易所)	孙耀庭	(18)
回忆参加抗战工作的几个片断	沈天亚	(29)
滇缅战役中的艰险点滴	伍蔚文	(39)
抗战回忆录	瀛云萍	(45)
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纪事	黄本仁	(54)
日本关东军见闻片段	尚允川	(76)
爱新觉罗，傅伟和宗社党	罗 英	(85)
鸿胪井的沧桑	瀛云萍执笔集体创作	(90)
唐太宗攻高丽和薛仁贵东征在大连遗迹初探	葛文录	(95)

大连市 民革的创建及“文革”前活动概况

庞赫中

(一)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我们从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三期结业的同学八人，在大连港务局人事处李科长的带领下，乘火车由北京来到大连港。我们是大连港毛达沟港长向交通部调派教学人员转请革命大学组织分配的。

我们八人，六人为民主党派成员。祭阳冰、蒋承璥、庞赫中、胡健君（女）等四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和农工民主党党员各一人。其余两位非党人士唐子清（已去世）后来成为民革联系人士，杨荷亭（女）一九八一年参加民革。

我们民革党员四人，多数是建国初期在北京市参加组织的。到大连港后一同被分配到大连海港技术学校工作。一九五二年初，我们商议决定成立民革旅大小组，开展组织活动，公推解放前在上海市参加地下民革组织，现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的祭阳冰同志为组长。这一举动得到中共海港党委和中央旅大市委统战部的支持，并与北京民革中央和沈阳民革东北临时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一九五

二年三月十五日接到民革东北临工会的指示和批准。此后民革上级组织的指示文件和党内刊物源源寄来，小组组织生活正常开展，旅大市第一个民革组织从此诞生了。

大连市过去被日寇侵占四十余年，“八·一五”在苏军帮助下获得解放。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公开接受政权时间不久，因此民主党派尚未发展到这里，初期的大连市民革党员都是从外地调进来的。我们四人民革小组成立以后，一九五三年五月苏石青同志调来大连石油研究所工作，一九五四年张文蕴同志调来大连工业俄文专科学校工作，谷绍奇同志调来大连电信局工作，陆续参加进来。只有大连中学教师付增同志是同年发展的。此时胡健君同志又调去北京交通部工作，民革旅大小组党员只有七人。

民革旅大小组（1952.3.15—1956.7.7）四年多的活动，除正常学习外，主要是参加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和政治运动。如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旅大市中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大连港纯洁队伍运动，以及学习“宪法草案”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周总理报告等。党员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受到实际锻炼。

中共旅大市各级党组织，对民革小组的成立非常重视。素以关心群众生活著称、为全港职工爱戴的大连港港长、长征老干部毛达恂同志，重视教育工作，重视知识分子，对民革党员来到海港非常关心，他深入到我们宿舍走访，嘘寒问暖，征求意见，我们到他家看望，被接待在会客室交谈，如坐春风。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海港党委书记王云同志亲自给民革小组党员上党课，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对民革党员的要求，一讲就是半天，有些民革党员被派为“打虎”队员。

在邀请民革小组党员代表参加的中共旅大市委统战部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中共旅大市委书记、统战部长、长征老干部郭述申同志莅会讲话，联欢时翩翩起舞，同我们亲切交谈。

在中共党组织的关怀教育和民革辽宁省委的领导下，民革旅大小组党员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心情舒畅，干劲倍增，工作都比较出色，有些同志被评为市和局的模范教师。

(二)

民革旅大小组活动期间，本市其他几个民主党派组织相继建立，中共旅大市委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工作逐步加强。民革东北临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五四年十月撤消，成立民革辽宁省级组织。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民革旅大小组于一九五六六年七月七日，被批准改建为民革辽宁省委直属旅大市支部（1956.7.7—1957.11.9），选举祭阳冰为主任委员，苏石青为宣传委员，谷绍奇为组织委员。

在此期间，除了正常学习活动外，主要抓了组织发展工作。一九五七年五月，经民革辽宁省委批准，发展大连电信局工程师袁凤祥，大连外语专科学校助教白国新，旅大师范学校教师朱树、大连海港水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伊树志等四位同志参加民革组织。同年七月六日，民革辽宁整风办公室发来指示，暂停组织发展工作。

一九五六六年十月付增同志调去北京二十五中学工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戴昌时同志调来大连中矿公司工作，此时党员有十一人。

一九五七年夏，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经过大

鸣大放大批判，大连港的祭阳冰、蒋承璈。大连外专的张文蕴三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民革支部受到冲击，处于瘫痪状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民革辽宁省委指示，成立民革旅大市支部整风小组（1957.11.9—1958.10.18），由苏石青、谷绍奇、庞赫中三位同志组成，苏为组长。

在此期间，主要开展整风学习工作，根据民革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学习文件，整顿思想、作风和组织。由于祭阳冰、张文蕴两位同志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分别被公安机关逮捕法办和由法院判处管制，因而开除党籍。

一九五八年六月沈天亚同志由北京交通部下放到大连港工作，同年九月谷绍奇同志调去沈阳邮电学校工作，此时民革党员仅有九人。

（三）

一九五八年十月民革辽宁省委直属旅大市支部，召开第二届全体党员大会。在会上进行了整风运动的总结，肯定了成绩，明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选举产生了第二届支部委员会（1958.10.18—1961.10.29）；苏石青（现任民革中央委员）为主任委员，庞赫中为宣传委员，沈天亚为组织委员。

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马大英、李德宣、杨锡勇、邹明初、张健冬等同志，先后由沈阳调来大连辽宁财经学院工作，杨文超同志调来大连辽宁师范学院工作，贵阳市社会成员张伯新同志调来本市，一九六一年六月谷绍奇同志由沈阳邮电学校退休回连，同年七月李德宣、杨锡勇两位

同志又调去安徽财院工作，同年八月苏石青同志调去太原市煤炭研究所工作。中共交叉党员郭廷梁同志早已从北京调在大连海运学院工作并取得联系。此时党员共有十五人。

一九五九年三月，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李世璋同志、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宣传部付部长邵恒秋同志等一行五人，到达本市视察民革旅大市支部，对我支部的工作表示满意。他们受到中共旅大市委、旅大市政府的热情接待。

一九五九年八月，民革辽宁省委指示旅大市支部选派代表一名，参加民革中央举办的学习会（即“神仙会”），我受支部委托，代表出席，到北京学习四十天。在人民大会堂聆听周恩来总理作的政治工作报告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作的统战工作报告。在会上介绍了民革旅大市支部总结的工作经验，运用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中共中央的国内、国际方针政策和民革中央的指示，收获很大。九月二十四日下午，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会议代表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这是对我们民革旅大市支部全体党员的莫大鼓舞和鞭策，终生难忘。

一九五九年旅大市政府，批给民革支部、农工支部编制一名，合并使用配备专职干部刁树人同志，到支部任秘书工作。拨给两支部共同办公用房一间，起初在上海路五号，后迁到玉光街六十号。

农工民主党中央直属大连支部，选派从北京革大回来的农工党员朱公颖同志到机关协助工作。刁树人、朱公颖两同志共同处理民革、农工两支部的机关业务。

当时民革、农工两支部的党员人数都不多，而且都不属

于市级组织，可是中共旅大市委对我们民主党派直属支部的工作特别重视，同其他民主党派市级组织一样，要求参加市里的活动，工作并不少。由于我支部党员所在单位比较分散，支部活动都不占用工作时间，一般开会、过组织生活都在星期天，规定两周活动一次，每次半天时间。同志们参加组织生活，都比较积极，很少缺席，有事请假。当时支部学习活动比较多，主持会议是我宣传委员份内的事，对于同志们组织观念强，出席率高，很受鼓舞，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位机关干部组织开会，发通知，做记录，写汇报，作总结，往往星期日也不得休息，十分辛劳。

(四)

民革辽宁省委直属旅大市支部，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第三届党员大会。在会上报告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总结。三年来的主要工作是：

1. 组织成员检查和修订自我改造规划；
2. 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推动成员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
3. 推动成员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文件；
4. 贯彻中共旅大市委和民革省委的指示精神，开展“神仙会”的学习。

选举产生了第三届支部委员会（1961.10.29—1966.5.16），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解放前参加民革的邹明初教授（已去世）为主任委员，庞赫中为宣传委员，沈天亚为组织委员。

在此期间的活动主要是学习时事政策，和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开展关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支部曾选派代表参加民革辽宁省委会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

为了开展社会联系工作，民革旅大市支部联系本市有影响的社会人士十六人，其中有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部队旅长，成都市参议长的孙铸颜（已去世），曾任伪州兴业银行襄理、关东行署财政厅付厅长、现任旅大市政协驻会委员的孙耀庭（一九八二年参加民革）曾任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的娄复民（已去世），和伪满时期与罗振玉研究金石文字的孙宝田等诸位老同志，与旅大市政协联合举办学习班，定期开展时事政治学习，并发动他们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撰写文史资料数十篇几十万字。这些颇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汇集在市政协文史办公室，可惜在文革期间，悉被付之一炬，没有保存下来。

一九六二年支部发展大连市商品检验局科长，旅大市政协会员张麟光同志为民革党员，同年张伯新同志转回贵州，一九六四年五月伊树志同志因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一九六五年戴昌澍同志调去黑山县工作，同年退休成员金兆纶同志从九江转来大连，此时党员共有十四人。

一九六二年八月，刁树人同志调到市委统战部工作，民革支委会秘书由许建国同志接任，他与朱公颖同志继续共同担负民革，农工两个支部繁重的机关工作，直到文革开始被迫停止活动后，将支部文件整理成册，保存在档案馆里。

(五)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支部所在地玉光街市政协大楼被红卫兵查封，支部被迫停止活动，至此结束了大连市民革在文革前阶段的活动史。

民革旅大市支部，在文革前活动的十年间，组织日益巩固，并有所发展，主要归功于中共旅大市委和民革辽宁省委的领导。而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落实到民主党派组织和党外人士身上，作为中共旅大市委办事机构的负责人，长期担任统战部长职务的张志诚同志，做了出色的工作，起到重要的作用。长征老干部张志诚同志，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待人诚恳，和蔼可亲，与党外同志交往，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他每星期三主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学习会，从无间断。在学习会上针对反映出来的问题，耐心细致地分析讲解，促膝谈心，情理并茂，很有说服力和启发教育作用，深受同志们的钦仰爱戴。后期他竟被错误地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惨死，实在令人发指！每当回忆及这段历史时，对这位为开创和发展我市统一战线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老部长，怎能不引起深切的怀念！

其次，须要说明的是我们文革前的大连市民革组织，从外地调来的和以后在本市发展的党员，总共不过二十余人，历史实践证明，他们都是好同志，在所在单位党委和民革支委会的领导下，虽然处在艰难曲折的境遇中，都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同志表现突出，尽心竭力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从

而使民革组织跻身于本市民民主党派之林，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今天大连市民革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果是来之不易的。

现在可以告慰的是，从反右以来曾被戴上政治帽子、或受法办的同志，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政策得到落实，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所有受委屈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妥善处理。祭阳冰同志平反后，担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并被推举为上海市民革顾问。国学根底深厚的蒋承璈同志右派得到彻底改正，他现已八十一高龄，身体硬朗，还力争能参加组织活动，经常赋诗、歌颂社会主义盛世。在社会办学工作中卓有成绩的伊树志同志和外语老师张文蕴含冤去世后，才得到平反昭雪。还有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曾在科技方面有发明创造、贡献卓著的高级工程师袁凤祥同志，也得到了平反昭雪。他们都恢复了名誉，得到了妥善处理。如果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于九泉矣。

这篇材料是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并查阅民革有关档案仓促写成的，没有来得及广泛征询意见。由于个人见闻的局限，记忆可能有出入，或者看法不全面，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请当年参加组织生活现尚健在的同志们补充指正，仅作为今后编修大连民革史的参考。

回忆我的父亲朱庆澜

朱 树

我的父亲朱成澜，字子桥，曾受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是第一次。积极地拥护他，第二次护法，1917年“辫子督军”张勋（扶清逊帝溥仪）复辟，段祺瑞以“讨逆”为名，重掌北京政权，筹建“安福国会”，自诩“再造共和”。孙中山先生当时在上海倡议反段护法，先父朱庆澜在广州以广东省长的名义通电拥护，与北京段祺瑞的政府决裂，并派员赴沪迎接中山先生来粤主持大计，于是中山先生率上海海军司令程璧光的起义舰队和部分议员到广州，开始组织军政府，经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先父将广东省长所属二十营军队拨给中山先生为革命武装，建立历史上所称的粤军。章太炎先生、伍廷芳先生曾来往联系迎接，（关于这方面的史料，我只知片段，待以后再写。）这次是他从政治上、军事上全力拥护中山先生。写这方面史料的人较多，我暂不赘言。

在辛亥革命时期，先父为十七镇统制，驻防四川，响应武昌首义，在四川成都加入组织“大汉军政府”任付都督，（辛亥年农历十月）宣布脱离清王朝，反对世袭封建帝制，诩赞共和，拥护中山先生。当时和四川省咨议局①立宪派人物以及同盟会中人员合作。仅就自己所知所闻，愿意以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的原则，写出一鳞半爪史迹，以供史家参阅。

一、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我家祖居浙江省绍兴县柯桥镇渔后村，先祖游幕山东。先父朱庆澜于 1874 年（同治十三年）生于济南。年幼时祖父母先后弃养，家贫。十九岁就离家到东北投军。有人写我父亲时说他是项城袁世凯氏小站练兵之基干，此为误传。实际上他到辽宁后，是投在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开始曾办团练，因他安定地方，守卫海疆，除暴安良，并引起了两件严重的国际交涉（当时称为洋人案件），于是名闻朝廷，因此一再为赵尔巽提升。

据我所知的几件事，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有关，特略述如下：

（一）、辽西有清王朝宗室洪其文者，横暴乡里，鱼肉人民，并藏匪坐分赃物，官府中无人敢过问。先父加以逮捕，并立斩示众，其家属赂中枢某御史上书参劾，该案件直闻朝廷。当时以一个汉族小官吏斩宗室满人，本是罪不容恕的，后将是非曲直辩明，才得奉旨免议。

（二）、光绪二十六年（1900）他已任绥锦三营统领，驻防辽宁田庄台一带，并负保卫海疆之责，当时有个美国付领事黑夜乘船在途中鸣枪，正遇哨官潘贵庭（后来潘氏在张作霖时代办军需工业，亦为省中知名人士）巡察，见其不守海防规章、误以为匪，立即开枪击毙。当时这是一宗洋案大事，美国方面直接与清廷交涉，（近代史有记载），清廷惧外，虑主管坐罪，上官授意可诿之于哨官，先父认为哨官守职无罪，慨然自承。时北洋大臣袁世凯亲自处理此案，颇壮

其行，给予革职留任处分，旋又由赵尔巽奏请开复，保候补道，为前路防营，任新军八营统领，独立第一标标统等职，以后又兼奉天巡警局总办，东北三省商务处会办，主持编练东北新军等职。

(三)、部下又杀日本兵之事，也以不屈洋案，就地解决（近代史中也有记载）。

(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爆发，两支帝国主义军队在我国领土上作战，清王朝软弱，不但不能维护自己国家领土主权，反而宣布中立。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由庄河花园口登陆，直扑旅顺口，而后陆军又指向奉天，因为当时帝俄陆军指挥部在奉天。

这两支帝国主义军队在我国领土上作战，他们都在我国辽东半岛上烧、杀、掠夺，使千百万人民遭殃，双方又都想把中国军民推入战火，为自己服役。

当时，先父率领新军驻守辽西一带，坚守防线，不为所动，保卫了这一带乡民，并收容了大批逃避战火的灾民，也为朝野所闻。

当时上海英文报纸“(North China Dayyl News)字林西报”访员曾写了这一部分军队的战斗力的部署和保卫地方，以免战火向辽西蔓延（1941年初，我在上海曾读过这篇通讯译文）。

他看到过八国联军入侵，京师陷落；他又亲身经历了日俄战争，深感祖国大地遭受帝国主义军队铁蹄的践踏和蹂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使他这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军官极为忧伤和愤慨，深感清廷昏愦无能，丧权辱国，因而在日俄战后，他自告奋勇，专心训练新军以图加强国力。

1905年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四大纲目“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也由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带到东北，宣传革命思想。

先父青年时代的朋友宁武（字梦岩，辽宁海城人。“文革”前辽宁省付省长，民革辽宁省主任委员）就是参加同盟会的留日学生，这和反帝思想结合在一起，因此得到启发和鼓舞，对孙中山先生产生了崇敬的思想。

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一直保持到晚年，在这方面也简单写几句。

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东北三省。当时他本已退出军政界多年，信佛教，读经书，做些社会救济事业。当时他不顾南京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也不顾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等人的反对，在张学良将军的同情下，在上海、北平奔走，团结了许多主张抗日爱国的知名人士，在北平组织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并向国内各界人士和海外华侨呼吁捐款，不但支援东北抗日部队和义勇军，同时又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诸位西北将领合作，支援、拥护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虽然敌伪曾用多种威协，利诱的办法，自己的亲朝好友如何叙甫②朱绍阳③也好心劝他“没有地盘，没有军队何须自讨苦吃”。的确，他也一再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打击，但他终不为所动，也可见他当时毁家纾难的意志。还记得“九一八”后，我全家人关，每当“九一八”纪念日时，他让全家停炊，绝食一天。看到报上登出日本向东北开拓移民建屯的消息，他就用笔圈上，让我们读。当然，他对东北父老兄弟也有着深厚的情感。知道他抗日活动的先辈还大多健在，在此文不多写了。